

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

——就儿童读经问题与郭齐家先生商榷
并议“横渠四句”

刘 晓 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影响很大。本文就郭齐家先生倡导儿童读经的主要言论进行了讨论。讨论的问题有：近百年是否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西方人对中国读经传统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国力？本文最后还对中国哲学史著名的“横渠四句”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儿童读经；“蒙以养正”；“横渠四句”；郭齐家

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¹，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广为流布，但这些言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论说理路，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应中国教育电视台约请，作为主张儿童读经的正反双方的反方，曾与郭齐家先生一起参加该台谈话节目“第一观察”，与其就儿童读经问题进行讨论。双方立场不同而各言其志，这次讨论被命名为《读经吗》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其实，针对这次谈话，电视台预定的题目是《拯救经典》，这可以反映出电视台有关人员对于儿童读经的态度。该节目将重点放在主张儿童读经（拯救经典）上面，而不是反对儿童读经上面。我的观点在录制现场是孤立的，因而我对主持人的提问往往难以接茬对应，所以言有未尽。在此我想针对郭齐家先生倡导读经的言论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近百年是否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曾经邀请郭齐家先生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²郭齐家先生演讲伊始，将中国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三皇五帝直

作者简介：刘晓东（1966—），江苏丰县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哲学、教育哲学、学前教育学。

¹ 郭齐家先生与王财贵先生、南怀瑾先生、蒋庆先生是倡导儿童读经的四君子。2004年，蒋庆先生在大陆编订《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曾激起《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激起论争，而蒋庆先生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前言》中劝导选择《读本》的家长 and 教师“向国内有关儿童读经的推广中心或网站索取王财贵先生与郭齐家先生关于儿童读经的文章和光盘，进一步了解儿童读经的理念和经验，这样，对开展儿童读经活动一定会大有补益”。（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前言》，见胡晓明《读经：启蒙还是蒙昧？——来自民间的声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由此可见郭齐家先生在儿童读经运动中的中坚地位。我曾分别撰文就儿童读经问题与王财贵先生和南怀瑾先生商榷，与蒋庆先生商榷的文章正在撰写中。

²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时间：首播2004年10月16日13:30—14:30重播10月17日23:35—24:35 10月18日10:00—11:00。本文引用的郭齐家先生的言论没有特别标明出处的均出自这次演讲。郭齐家曾发表同名论文，见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载《湖

到清朝末年，郭齐家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很重视人文教育，故名之曰人文阶段。近一百年来引进西方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教育，郭齐家先生认为这种引进、移植非常成功，对中国的面貌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第二个阶段名之曰科学阶段。中国的教育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把前两阶段的优点集中起来，要形成一个科学和人文整合的新的教育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否准确，读者自可研究。但郭齐家先生认为近百年我国对西方教育的引进和移植非常成功，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西方教育最根本的乃是其教育的近现代立场、观念和方法，也可以说是教育的现代性。中国近百年来引进的西方教育主要是在于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方面，但西方教育背后的近现代立场和观念并没有真正抵达中国。在《“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之“五、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与中国儿童教育的改造”中，我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³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主张儿童读经的那些国学大师对现代儿童教育观念是陌生的。

2. 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实际上是普遍的无知状态，尽管周作人、鲁迅、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先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宣传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

3. 尽管也有学者甚至普通家长已经具有正确的儿童观念，他们也在不断呐喊。然而在无知的海洋里，他们只是汪洋中与风浪搏斗的孤单小船。

4. 中国文化还没有在自己的深层结构中吸收近现代教育观念，中国儿童教育需要立场上的更新。

学习、引进和移植西方的教育百年而未得其思想精髓即儿童教育的近现代立场和观念，能说这种引进和移植成功吗？我们引进和移植的都是形下之器，而其形上之道我们却视而不见，或者即便见到了，我们却鄙视、批判，例如透过卢梭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遭遇便可见其一斑。“21 世纪的中国迄今没有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容纳近现代教育观念，原因何在？或许中国文化传统在深层结构上便与近现代教育观念有相互矛盾不可调和之处。这就从教育学的角度发现了中国文化传统需要进行深层改造的一个理由。可以看出，教育批判无法脱离文化批判，教育改造无法脱离文化改造，在中国文化正在发生转型的这个大时代，更是如此。”这是我在写作《就儿童读经问题与南怀瑾先生商榷》时的思考。而儿童读经的倡导者如郭齐家先生者，不考虑经书的内容是否值得反省，不考虑死记硬背的读经方法是否值得反省，便积极主张儿童读经，我以为颇为欠妥。

二、西方人对中国读经传统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

郭先生演讲伊始便臧否“五四”：“‘五四’引进了科学技术非常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有一个缺陷，缺陷就是把中华经典文化给解构了，在教育上不提它了，渐渐我们中国人从教育上把自己民族的经典文化开除了，这个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没有过的。每一个民族都很重视自己的经典文化、传统文化，但唯有我们中国现在把自己的文化消失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是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阶段就希望能够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少儿读经。”

“五四”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应知道解构了什么样的文化。我以为像先秦诸子、王充、陆王、李贽等人身上还是有思想火光的，有生命的火光，进步的火光。我们应当学习这些东西，而不是学习封建意识形态。即便是学也应当存菁去芜。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绝对不

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一期，第 49—52 页。

³ 刘卫东.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69~70

能主张很小的孩子死记硬背，更何况是让小孩子死记硬背那些具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内容呢！我看不出儿童读经“能够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结合起来”。我倒是觉得将封建性的东西和现代性的东西“结合起来”本身就不会生出什么硕果来。请以飞机制造为例，如果将错误的数据和正确的数据“结合起来”，那么飞机很难上天，即便能够上天，那么上天后也是危机四伏的。

郭齐家先生主张：“我们这些‘经典’从小就要让孩子熏陶。西方也是一样。”其实，西方教育绝对不会让小孩子死记硬背他们的“经典”。倒是西方人对我们的读经传统大惑不解。针对中国的这种教育传统，一位英国人在一百年前评论说：“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⁴这位外国人费解的是，中国的“学者和圣人们”为什么让小孩子读那些远离了儿童生动生活的经书？为什么拒绝从“猫”“狗”等贴近儿童生活的内容开始他们的学习呢？他这样评价中国的“经典”课本：“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书的作者恐怕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书的内容因单调而显得死气沉沉，既缺乏幽默又少机智，他们最大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从来不会在孩子们那活泼爱笑的脸上增加一点儿轻松。”⁵

郭齐家先生说：“我们这些‘经典’从小就要让孩子熏陶。西方也是一样。”不知他看到上面的文字该做何种感想。

其实还有相关的材料供郭先生思考。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转发了一篇《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的文章，对中国的背书制度进行痛贬：“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中。”“能背诵孔孟的著作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仅仅把一些简单的词句硬塞进一个人的脑袋里，这绝对算不上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人的大脑除了记忆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功能，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这位《伦敦日报》的通讯员还报告了他在小学堂看到的景象：“当我发现这些小家伙们正朗读着的课本并不是什么儿童入门之类的书籍，而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时，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有人指给我看的一位男孩正朗诵着孟夫子的作品，还有人对我说谁能背诵清国著名学者所有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请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能凭记忆把它们背诵下来，如此你就不难明白大清国人的教育方式了。”⁶

请我们想象一下，当这位老外看到小孩子们不是西方的“猫活狗活的儿童入门”，而是中国最古典的著作，这位老外应当受到了怎样的心灵震撼，而这时旁边会有中国人无比自豪地指着他最得意的门生某某小孩子，说他能背诵多少重要人物的文章或讲话。呜呼！

可是，郭齐家先生又是怎样劝导中国人推行少儿读经呢？

郭齐家先生写道：“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有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⁷于是，郭齐家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应当推行少儿读经。不过我以为，爱因斯坦所说的“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有阅读、不欣赏的人”应当是成人或大年

⁴（英）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83

⁵（英）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83

⁶ 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记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9页。

⁷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第52页。

龄的儿童，不会是指很小年龄的孩子。爱因斯坦大概不会同意郭齐家先生让处于幼儿阶段的小孩子来死记硬背“世界名著、文学名著”的。

其实爱因斯坦非常重视教育中的民主和自由，坚决反对强制、灌输，他认为强制、灌输是创造性、好奇心、想象力的大敌。爱因斯坦 1946 年在其《自述》中写道：“现在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⁸1955 年 3 月，即在他逝世前一个月，为纪念他的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成立 100 周年而写的回忆录中，他又发表了类似的思想：“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⁹“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¹⁰透过爱因斯坦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如果爱因斯坦在世的话，他会坚决反对儿童读经的。

郭齐家先生还借用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的言论：“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族群，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¹¹按照郭齐家先生的意见，有了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为了表达对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拥护、爱戴和崇仰”，那么中华民族年幼的下一代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应当接触、诵读、记忆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言论和教诲。然而事实上，有过童年读经经历的值得“拥护、爱戴和崇仰”的伟大人物鲁迅，成年后却坚决反对儿童读经。还有，郁达夫如果知道郭齐家先生引用他上述言论劝导儿童读经，不知他要作何反应。

郭齐家先生还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有那么多文化经典，为什么不培养少儿诵读呢？既然西方的教育理念之一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类似的教育理念：‘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与真理同在’呢？”¹²其实，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英国人麦高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他对中国的“学者和圣人”让八九岁的孩子读那种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以开始学习生涯的做法极为惊诧。¹³无独有偶，一百三十年前，《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在清朝时期的一个小学堂，看到幼童正朗读着的课本不是儿童入门之类的书籍，而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他是如此惊讶，以至向他的英国读者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请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能凭记忆把它们背诵下来，如此你就不难明白大清国人的教育方式了。”¹⁴他要让英国人将心比心：如果这种学堂出现在当时的英国，英国人该作何感想！

显然，西方人并不像郭齐家先生所言让他们年幼的小孩子“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更不可能像郭齐家先生主张托儿所的孩子通过背诵《论语》、《老子》而“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与真理同在”，西方人是不会让咿呀学语的儿童去记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的。

⁸ 许良英等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8

⁹ 许良英等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45

¹⁰ 许良英等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44

¹¹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 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一期, 第 52 页。

¹²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 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一期, 第 52 页。

¹³ (英) 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83

¹⁴ 郑曦原编, 李方惠等译:《帝国的记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第 28-29 页。

西方人是反对死记硬背的中国式读经的。然而，郭齐家先生却认为西方人是主张幼童们诵读经典的。他说：“既然西方人从小诵念《圣经》，伊斯兰人从小诵念《古兰经》，我们中华民族有那么多的文化经典，为什么不培养少儿诵读呢？”在郭齐家先生看来，中国的孩子有福了，他们的祖先留下如此众多的经典，他们就慢慢地死记硬背去吧！

我们这个民族的“圣人”们喜欢让儿童读经，但西方人却让小孩子们读“狗话猫话”那些为中国的“圣人”们所不齿的“不正经”的东西。没有听说现代西方人要让小孩子大规模去死记硬背西方的所谓“经典”。

但是，2004年，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启动了一项据说是“有趣的”计划。计划在2007年4月23日——莎翁诞辰四百四十三周年的那一天，将由自愿报名组织的一千名中国儿童，同时用英文原文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呈现“千童背诵莎翁经典诗句”的壮观场面。组织者将此计划视为华人“少年读经活动”的一部分。

其实，西方人未必就愿意让他们的小孩子去死记硬背莎士比亚的作品。教育电视台邀请郭齐家先生和我参加他们的访谈节目，后来以《读经吗》为题播出。其实当时访谈时的题目是《拯救经典》，而节目开头纪录片画面就是许多儿童列队整齐背诵莎士比亚作品。当时我就指出，风靡全球的华人儿童读经运动原来不只是关注中国“经典”的失传，而且担心英国莎士比亚的埋没，但是没有听说莎士比亚故乡的人们对其失传的担忧，反倒是远隔万里的中国的“圣人”们担心莎士比亚的失传，并要用自己传统的儿童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拯救经典”，拯救莎士比亚，不知莎翁的在天之灵和莎翁的那些英国老乡们是否领情！

中国正处在“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尚待解决这一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最要紧的是寻觅前车之鉴，走传统未曾规定的新路。因此，我主张成人读经，不主张儿童读经。所谓主张成人读经，也是主张批判地读，而不是死记硬背，奉为金箴，盲目信奉，生搬硬套。我主张取菁祛芜，尤其是寻觅民族文化发展的前车之鉴，这就是读史使人明哲的部分意义。

我反对儿童读经。所谓儿童读经，其实目前大致说来，是让儿童死记硬背。我反对死记硬背，但我不反对小孩子读点唐诗宋词、背诵几段《三字经》，但我反对大量背诵，那不是熏陶小孩子，那是祸害小孩子。我不反对小孩子接触所谓经典，但我反对把小孩子接触所谓经典搞成一种运动，搞成一阵风。

三、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

郭齐家先生提到，1995年赵朴初等九位全国政协委员以016号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呼吁》指出：“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

这份提案反映了九位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因而我是尊重这几位老人的，我也尊重这几位老人的提案。但是，我以为应当正确看待这份提案。我们不应反对对几位文化老人所提出的建议进行科学的关照和反思。在这一点上，我在《就儿童读经问题与南怀瑾先生商榷》一文中表述过相关观点。

不必从幼童抓这些事情。这是成人的任务，不应强加到小孩子头上。把成人的任务强加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做痛苦地做力不能及的成人们的事情，那是我们文化的坏传统。

郭齐家先生说：“现在世界上七大母文化，现在已经有六个消亡了。母文化就是原生文化，只有我们中华文化还保留下来。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消亡，不仅对不起我们中国的列祖列宗，也对不起世界人民，也对不起人类。”照郭齐家先生的说法，避免中国文化消亡的方法就是少儿读经。

郭齐家先生提到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先生讲过的一句话。闻一多先生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征服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之。”郭齐家先生用闻一多先生的这句话作为儿童读经之所以具有必要性。其实，被外族征服后发生的文化变迁甚至文化灭绝与文化自觉的改良与革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中国人努力要保护，在鲁迅看来，那来灭她的人往往会反过来比原来更加一等地对其崇奉和利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还说：“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多奖励你读中国书，孔子也是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鲁迅：《集外集拾遗·报〈奇哉所谓……〉》）当然，这是鲁迅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特殊的语境里所说的无比激愤的话。我想，他的原意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经典著作里藏有明显的糟粕，不加检视地一味崇奉、一味回转，那是错误的；中国人必须走新路，中国文化必须要变革。他在《故乡》中所写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其实就是鼓动中国人走传统未曾规定的新路子的。

废止儿童读经并不意味着成人就不读经，并不意味着儿童长大后不让他们接触经典。我反对让小孩子死记硬背经典，但并不反对成人接触经典，甚至不反对一部分儿童长大后以读经、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为自己的专业和事业。

郭齐家先生还说：“假如我们把文化接上，不让它中断，让它发扬光大，那我们就成为民族的功臣，历史的功臣。所以你究竟是做民族的罪人，还是做民族的功臣，就在这一念之间。”“为什么让少儿读经呢？就是回溯源头，传承命脉。”这些话颇值得反思。儿童读经运动对于读经的内容，尽管五花八门，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四书等儒家经典。儒家学说便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吗？我以为只是源流中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源头号称百家。先秦时期百家竞鸣，诸子竞放，被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我以为中国文化应当与先秦诸子（当然包括儒学）接续，而不是与汉武帝刘彻以后罢黜诸子独尊一家之儒学直接对接。把儒之一家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未免太过牵强。罢黜诸子，独尊儒家，恰恰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源头，非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

四、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

郭齐家先生以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这句话为依据，指出“在几十万年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口耳相传，背诵民族歌谣、背诵民族史诗、背诵自然和社会常识、道德格言等，这种诵读活动既保存了人类的文化，又发展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童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它必然也反映在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中。”¹⁵显然，在郭齐家先生看来，人类的童年时期是在“诵读活动”中度过的；由于“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因而儿童也理应在“诵读活动”中度过。

其实“背诵民族歌谣、背诵民族史诗、背诵自然和社会常识、道德格言等”是几十万年人类种系历史发展到晚近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在人类的童年，人类“保存了人类的文化，又发展了人类的智慧”也绝不只是“诵读活动”。原始劳动、原始工艺、原始游戏、原始宗教等等是人类早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其比重应当远超“诵读活动”，它们同样作出了“保存了人类的文化，又发展了人类的智慧”的伟大贡献，这种贡献可能远超简单的“诵读活动”。

同样，儿童生活中不是不需要记忆，甚至也多多少少需要“诵读活动”，但是，这并不是说，儿童就应当在记忆和“诵读活动”中度过。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艺术的、好奇的、

¹⁵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2页。

探究的、涂鸦的、歌唱的、蹦蹦跳跳的……，也只有在这种体现其天性的生活中，儿童快乐地生活着、成长着。认为儿童理应在“诵读活动”中度过，认为“勤有功，嬉无益”，是尚未达到儿童教育的近代水平的旧观念，这些观念是旧教育的理论基础。类似的老套话语系统已经被卢梭、杜威等人的近现代教育学说彻底清算过。遗憾的是，儿童教育的近现代立场在中国还处于缺席状态，尽管周作人、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努力宣传过。

郭齐家先生还说：“13岁之前是人记忆力的高峰，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人类历史文化名著，就可以激活儿童的脑力，训练记忆力，发展其智力，开发其智慧。”“诵读文化经典可大大促进大脑的发育。”¹⁶郭齐家先生为什么会认为读经有如此神功呢？原来这是郭先生“从幼儿大脑的成长生理角度”探察的结果：“初生的婴儿头脑里约有140亿个细胞，和成人的脑细胞数量一样，但脑重量却不一样，初生婴儿是0.6公斤，成人却是1.5公斤。这些增加的重量就在于细胞和细胞间网络的连结。3岁时网络连接大约完成50%—60%，6岁时大约完成60%—70%。”¹⁷由于6岁前脑发育如此迅速，尤其是3岁前更为迅速，郭齐家先生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在6岁前，甚至3岁前，要给孩子许多文化刺激，包括听最好听的音乐，看最好看的画，读最好的古代诗文等，因为每一次的刺激，都会使脑细胞多一些连结。刺激越多，连结越多，网络越完善，智力发展越快。”¹⁸学前教育如果可以简单化到6岁前，尤其是3岁前，给儿童大量“最好的”文化刺激，如果这种简单化是正确的，那么学前教育就可以取消了，因为郭齐家先生的这种儿童教育学根本就不用研究儿童的特点、儿童的需要、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本能、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文化、儿童的世界，从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儿到杜威、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直到马拉古齐所倡导的“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发展的大纲”这一基本原则也就破碎了，维果茨基提出的教学应当尊重儿童的“最近发展区”的原则，以及其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儿童发展和儿童教育的艰难探索原来竟是“庸人自扰”。然而事实上，将学前教育简单化到把小孩子看作文化刺激的接受器而给他们大量“最好的”文化刺激，这种观点有违人类现代教育最粗浅的常识。

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郭齐家先生还谈论了背诵理论，其观点基本上与王财贵先生“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一样。由于我曾著文对王氏背诵理论评论过，这里就不赘述。郭齐家先生还另有见解：“背诵也要靠训练，你要不训练他，他始终不行的。”为什么要进行背诵的训练呢？我注意到郭齐家先生也是“从幼儿大脑的成长生理角度”来寻找理由的。郭齐家先生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岁之前你就要注意，甚至于几个月你就要注意训练他。”由于脑发育如此之快，郭齐家先生便认为，应当相应地向6岁前尤其是3岁前的儿童给予“许多文化刺激”，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的刺激，都会使脑细胞多一些连结”。而所谓的文化刺激是什么呢？就是让6岁前尤其是3岁前的儿童“听最好听的音乐，看最好看的画，读最好的古代诗文”等等。

为什么脑发育迅速的时候要相应给予“听最好听的音乐，看最好看的画，读最好的古代诗文”等等文化刺激呢？郭齐家先生说：“人类终其一生，脑神经元细胞数目不变，神经突触数目决定智能高低，多刺激多使用头脑，可增加突触数目，而此作用必须在3岁前才有效。若3岁前脑神经元没受到足够的刺激，不仅不增加，连原有的脑功能都会退化。”¹⁹然而，就我所了解，在一个正常的文化背景中，儿童出生后自然会受到母亲的哺乳、喂食、关爱和其它的社会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儿童都会正常发育成长，包括脑的正常发育。越是年龄年幼的儿童他的发育相对来说确实比较迅速，但其迅速发育的内因是生物遗传因素，文化、教育是其发育成长的外部条件，文化、教育要适合儿童发育的需要才能发挥作用。

¹⁶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2页。

¹⁷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2页。

¹⁸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2页。

¹⁹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2页。

儿童早期的迅速发育并不天然地决定这一时期他比童年后期更需要文化刺激，恰恰相反，并不是文化刺激越多对他的发育越好。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费歇尔教授研究发现，对儿童进行揠苗助长式的刺激会对儿童的整体成长系统产生弥散性影响，使整体发展脱离平衡状态，并且在接受不当的催早熟刺激的那个领域，产生较为低下的发展水平。²⁰

郭齐家先生还说：“这里所说的文化刺激，其实就是早期教育。”应当怎样进行早期教育呢？郭先生取譬论述：

“譬如两个月大的婴儿，随时让他聆听古典音乐，视线所及处挂上多彩的图片”；

“4个月大的婴儿常让他捏玩物品，常和婴儿说话”；

“甚至6个月开始，在小床上悬挂字词，教他看字，并且多讲故事给他听，引导他认识周围的事物、花草、桌椅、灯等等，再大一点可带他去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科学馆等等。”²¹

如果郭齐家先生真的将他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譬如让两个月大的婴儿随时聆听古典音乐，并且视线所及到处挂满多彩的图片，譬如教6个月大的婴儿看字和多听故事，并引导他认识周围的事物，那么，这个婴儿的脑发育该是怎样的情况，是否他的脑就比其他没有受这种“早期教育”的孩子“多一些连结”。郭先生认为“每一次的刺激都会使脑细胞多一些连结。”不知这个婴儿多了好的“连接”，还是多了坏的“连接”。

但是，在郭齐家先生看来，以上的文化刺激、早期教育还不是最佳的，最佳的文化刺激也即最佳的早期教育却应当是开始教几个月大的孩子读经。郭先生的原文是：“当然给他听文化经典诗文，教他念唱，这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经典诗文在文字上运用非常精练，而且是各门学科的高度浓缩，举凡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人伦、道德、历史……包罗万象，可谓对人生、世界，甚至神秘宇宙的智慧结晶，让儿童诵读经典将受用一生。”²²由于郭齐家先生认为经典是“经典诗文在文字上运用非常精练，而且是各门学科的高度浓缩，举凡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人伦、道德、历史……包罗万象，可谓对人生、世界，甚至神秘宇宙的智慧结晶”，所以最佳的文化刺激便是开始教几个月大的孩子读经，如此便可让儿童“受用一生”。呜呼！对此我呆若木鸡了！

五、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

正是因为三岁前儿童脑发育迅速，所以才应当避免人为地骚扰它发育的自然进程和自然速率，人为的东西在自然的造化面前是可笑的。维果茨基曾经说三岁以前的教育大纲应当完全是儿童自己的大纲，实际上是反对成人对儿童的指手划脚那样的干扰。而郭齐家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由儿童三岁前脑发育之迅速而推导出“所以三岁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三岁之前你就要注意，甚至于几个月你就要注意训练他”这样的教育理论来，其实是错误的。

郭齐家先生说：“甚至于几个月你就要注意训练他。譬如说让他听最好的音乐，世界名曲。让他看最好的画，世界名画。让他听圣贤的教导。你比如说让他听唐诗宋词，给他朗诵《论语》都可以。让他慢慢听，两、三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训练他，……”将唐诗宋词和《论语》朗诵给几个月大的小孩子听，以“蒙以养正”，很有点大气功的味道、巫术的味道、神秘主义的味道，这与科学肯定沾不上边。

郭齐家先生还说：“让他听圣贤的教导。你比如说让他听唐诗宋词，给他朗诵《论语》

²⁰ 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²¹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第52页。

²² 郭齐家：《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第52页。

都可以。让他慢慢听，两、三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训练他，首先是三岁以前发展右脑，三岁以后它就慢慢发展左脑，右脑是靠形象思维，左脑是靠逻辑思维。所以右脑和左脑是有这个次序，先是右脑后是左脑。然后六岁以后，左脑和右脑一起发展，全脑一起发展。”

其实，三岁前也要关心和发展左脑，三岁后也要关心和发展右脑。脑生物学家对待外部条件干涉大脑发育往往持极端谨慎的地步，而有些教育家听风就是雨，把脑看作可以揉捏的面团，或者视为可以任意向其中灌水灌化肥的菜园子，这是错误的。

郭齐家先生还用《易经》上的“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句话来说明读经的重要性。“蒙童时期应该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因为他比较单纯，这个时候你把乌七八糟的东西给他，他也能接受，那很快他就成为一个不是圣人君子而是小人了。所以他是一张白纸，你给他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天天给他放古音古乐，放圣贤的话，他就慢慢接受。你天天放那些色情的、暴力的，他也接受。你还不如教他，把人类最好、精华的东西教给孩子，这就是圣功。”

这些话乍听都不能再正确了。郭齐家先生将读经与看色情、暴力放在一起，让人念起读经的好来；将二者供人们选择，人们肯定容易选择读经。但我想提出这一问题：所谓经典中有没有封建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蒙以养正”是这种偏重死记硬背的方法，那么它是否也是“乌七八糟的东西”？让小孩子死记硬背古代经典，他们能接受能“养正”吗？所以外国人就很不理解中国的圣人们，为什么要将“大道理”教给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对这一问题，我在《就儿童读经问题与南怀瑾先生商榷》一文中详细讨论过。

在郭齐家先生在凤凰卫视演说“少儿读经与文化遗产”的自由发问阶段，有位听众问：“在咱们国家漫长的经典流传过程中，必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会出现理解的偏差或者一些刻意的歪曲，然后就会相继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您觉得现代人读经，怎样面对现代人的阐释，还有经典原意的问题？”郭齐家先生回答中有这样的话：“经典可能也还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时代要求的東西，也有些过时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尺度）来筛选，来理解。有些是常理常道，符合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界的都是“经典”，这些原理我们要继承。至于有一些譬如说，它只适合它那个时代，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分析批判地吸收它，不要一股脑儿地吸收它。”郭齐家先生的这种回答我是赞成的。但是，既然郭齐家先生主张少儿“背诵”而不求甚解，那又如何要求小孩子“用现代人（的尺度）来筛选，来理解”呢？郭齐家先生主张的背书理论和这里的“理解”和“筛选”是自相矛盾的。明明知道“它只适合它那个时代，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分析批判地吸收它，不要一股脑儿地吸收它”，那又如何以背书的方式来“蒙以养正”呢？古人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让小孩子读经，尤其是让小孩子还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听人朗诵《论语》，那其中即便微小的偏差不也是很危险的吗？又何以“蒙以养正”呢？

让我们听听郭齐家先生是怎样谈论读经背后的科学依据的：

“……再从左右脑的发展来看儿童读经典，3岁以前是右脑能力最强的时期，3—6岁，其机能渐转入左脑，到了6岁则以左脑活动为主。左脑是理性的脑，右脑是感性的脑，左脑用语言，右脑用想象力来思考、记忆、传递情报及学习。右脑记忆情报十分快速，它能将看、听、想的事物，全部图形化思考并记忆，而且不会忘记，有自动处理功能，学习容量无限。

“6岁以前幼儿的认知模式是直接认知外界的刺激，即“直接记忆的模式学习”。幼儿将文化经典智慧烙印在脑细胞的无意识层，以后进入思考发育期，就以才能，性格表现出来。儿童诵读经典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存入脑中，不但可以美化身心，而且可以改变气质，净化灵魂，优化品格，儿童诵读经典不强求他理解，只要他当儿歌或广告词来念，自由自在、

愉快自然地多读几遍，如此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脑内充满知识，心情平静，心中充满爱与温柔，右脑充分开启，情绪智商全面提升。再说诵读文化经典时，文字形象经由视觉刺激右脑，念唱的音韵启动右脑，加上读字认字刺激左脑，所以是全脑的运动。经典教育非常适合幼年，而且是越早开始越能发挥启迪智慧、教化人格的功效。”

我对上述言论只是存而不论，留给专业人士阅读和评判。

六、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国力？

郭齐家先生还提到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科学家幼年都背诵过经书，这对他们后来的成功有决定性的作用。“教育也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效率。所以你得算一下账，当然你现在教你孩子学钢琴，学些儿童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经典从小让他读了，甚至于背了，他能背得很多经典以后，他将来原创性的东西就很多。”“所以大家要算一个账，算一个账，教育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高的效果、效率。我觉得从小读经不费事，孩子你别看他小，我现在看到六岁的孩子背老子的《道德经》已经背得呱呱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他的智力得到开发，他记忆力非常好。第一部经典非常重要，第一部经典你要训练他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读得滚瓜烂熟。第二部就要不了这么费劲了，第三部、第四部经典他读几遍就会了。他把记忆力开发出来了，所以读几遍就可以。他的记忆力比我们成人要高多少倍，特别是十三岁以前，你把他训练起来，不得了。我们千万不要用大人的观点来看，我都记不住，你记不住他记得住。”

让小孩子将“经典”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读得滚瓜烂熟，就能把记忆力开发出来，等到读新的经典的时候，读几遍就可以了。不知郭齐家先生这些话是信口说说还是有凭有据的。我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个民族要让小孩子将他们自己民族的“经典”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读得滚瓜烂熟或“背得呱呱的”；我也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个民族要让小孩子将他们自己民族的“经典”读三百遍，四百遍，五百遍，并用这样的办法来开发记忆力。在这里我不得不呼吁：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体现人道主义，应当实现人道主义。

郭齐家先生还说：中国人的聪明就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用经典来开发他的大脑，就把他的智慧打开。所以说脑力即国力，我们一代一代的把经典灌输给孩子，让他训练出来”。按照郭先生的意见，让小孩子死记硬背，“把经典灌输给孩子”，就能将小孩子的智慧打开，强健了脑力，当然也就强健了国力，中华民族的科学、民主、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而然便会格外发达。

郭齐家先生认为儿童读经就是开发脑力，而“脑力即国力，中华文化经典训练了中华儿女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增强我国的国力”。他又引述《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用以引发这样的号召：“修身从读经开始，造成全民族的阅读风气，首先是造成阅读经久不衰的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可以实现！”

遗憾的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读经大国，自庶民至天子，无一不重读经。《神童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然而，读了成百上千年的经，竟然读到几将亡国灭种。看来郭齐家先生开出的强民强国的药方是已经实证为有害的错误的老方子。郭齐家先生在演讲的最后说：“希望从少儿读经，然后影响全国读经，形成一个风气，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指望从少儿读经发展到全国读经，来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那是永远无法达到的。指望读经一途，别说是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法到达，非读到中华民族难以在地球存身不可，这大概是郭齐家先生所不愿看到的。

七、主持人王鲁湘先生的高见

这里也还要说说主持演讲的王鲁湘先生。他说：“非常感谢郭教授精彩的演讲，我一边听，我也听得入迷了，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三岁、六岁、十三岁，这三个关键的阶段，我们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也都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家长别的相关知识不多，关于怎么教育孩子的知识他全有。可是他想，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论语》，我还不如让他读 ABC。六岁的时候你让他读《老子》，我想还不如让他进行一点学前教育，赶紧考一个重点小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你让他读一点像《孙子兵法》，甚至有些还读《红楼梦》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十三岁很重要，这个时候考中学，重点中学非常关键，这个时候数、理、化的东西，什么东西，那个时间很紧要，所以可能是处于这样不同的价值判断，结果就把孩子读经的时间给耽误了……”

其实王鲁湘先生同他所批评的“中国的家长”并不是处于“不同的价值判断”，二者间的思考方式是十分相同的。“中国的家长”看重的是升学，王鲁湘和郭齐家先生一样看重的是读经，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兴趣、儿童的需要，对于幼小儿童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习而是成长。郭齐家先生宣传的儿童读经不对，一般家长的应试教育也不对。王鲁湘先生摒弃应试教育，这是可贵的，但却滑向了儿童读经的倡导。古人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讥讽之语。其实在这里，王鲁湘先生是五十步笑五十步，甚至是百步笑五十步。

王鲁湘先生还说：“我估计圣人之言，比一个简单的美国广播公司，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学前教育的什么，那个简单的一加二等于三的这种东西，对开发你的智力要有用得多。”其实，学前教育的要义在于儿童的游戏、幻想、涂鸦、艺术等等童话或神话般的生活，这种生活符合儿童的本性，是儿童成长的精神食量，可以帮助儿童茁壮成长和拥有充实的丰富的童年生活，可以保护和激发儿童的天性、儿童的生命力、充实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的生命的、精神的成长潜能得到尽可能大程度的张扬和实现。当然，目前的学前教育除了读经问题外，还有其它亟待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八、“横渠四句”献疑

郭齐家先生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提到“横渠四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安排的《拯救经典》（播出时改为《读经吗》）谈话录像结束后，电视台希望访客留言。郭齐家先生的留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宋元学案》引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张载（横渠）的四句话，被后世称为“横渠四句”。

冯友兰先生在所写的著作中多次引述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例如《新原人》的《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此“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一句，反映了冯友兰先生对横渠四句的无尚评价，他认为横渠四句应当是哲学家的使命，相应地也是哲学的使命。

其实，我曾经非常崇拜“横渠四句”。在拙著《儿童教育新论》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当代巨儒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中国儒者的使命历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中国，每一个传统的儒者都是教师，每一个传统的教师都是儒者。不管他是大儒还是小儒，都是儒。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儒者的使命，仅仅听听这几句话，就已经够激动人心的了。”²³

冯友兰先生所著哲学史和“新统”哲学对我影响很大。在拙著《解放儿童》的序言中，我曾经这样记录读冯著的情思：

²³ 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9 页。

“1997年寒假期间，我在背阴的房间里读冯友兰，读他的本是七卷却只出六卷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那年的雪真是大！我住在南京师范大学三舍的顶层，别人房间的雪都融化了，唯独我的房间还铺着一层白茫茫的积雪。天寒地冻里，身处这看不到阳光的暗室，我的生命却如沐春风；每日两餐，囫囵吞枣，不知滋味，但先哲的思想却是如此的馨香。倘伴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我就这样陶醉着，陶醉着她的深邃渊远壮阔，陶醉得回肠荡气、忘乎所以！倘若当时有人问我：‘你是谁？’我一定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祖先是那么的伟大，我们作子孙的固然会觉得自命不凡。我就是这样地迷恋着先哲的思想、感佩着我们民族的脊梁。”

尽管后来我对“新统”之新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新统”仅仅是“接着讲”，而且甘愿“接着讲”，因而“接着讲”尽管有许多好处，但是它却难以对“圣学”进行必要的反省和检视，甚至反对对“圣学”进行必要的反省和检视，因而严格的或极端的“接着讲”本身也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束缚，从而此立场骨子里依然有旧文人旧哲学的立场，与现代学术立场还是有差别的。但我并不一味地反对“接着讲”，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做学问就应当“接着讲”，但我反对强迫性的“接着讲”，反对唯“接着讲”，反对非“接着讲”不可。后来，久久未能面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为著作名称）在大陆出版了，这是冯友兰先生生命的最后两三年的绝笔，是在“斩名关”、“破利索”，“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的境界从事哲思的记录，其中确有脱去思想枷锁的许多文字，只可惜哲人已萎，不能在此境界上立言立论创新真正的“新统”了，悲乎！就是在这一部初露新哲学曙光的著作的结尾，冯友兰先生写下了横渠四句为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作总结，同时也是“明志”，表达他一生哲学生涯的最高追求：

乱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此处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一生都在实践他《新原人》自序中对横渠四句“应自期许”的豪情壮志。

其实不只是冯友兰先生一人如此。横渠四句是中国历来正统的大小文人的最高追求。但就在郭齐家先生写下横渠四句后，促使我当下反省，当下立悟，以当下已经转变了的立场重新观照张横渠的四句话。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赞同和再体认这几句话。

我反对“为天地立心”，因为天地自有其心。哪个人能为天地立心？其实正相反，是天地为人立心。

其实程颢就曾说过：“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²⁴乍看结论“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似乎是说天地“无心”，但是为什么说天地“无心”；万物的心便是天地的心。可见天地自有其心（“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之语中之“其”便是指“天地”），并且，天地的心是第一位的，万物的心包括人的心原本是天地的心，是天地赋予的，因而是第二位的。如果圣人是人的话，那么圣人的心依然是第二位的，是得之于天地的，怎么能够反过来“为天地立心”？

清代学者王夫之对张载《正蒙·天道篇》如此阐释和概括：“此篇因天道以推圣德，而见圣人之学，惟求合于所自来之天而无所损益；其言虽若高远，而原生之所自，则非此抑无以为人。周子曰：‘贤希圣，圣希天。’希圣者，亦希其希天者也。……”²⁵也就是说，从《正

²⁴ 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

²⁵ 张载：《张子正蒙》，王夫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蒙·天道篇》来看，张载主张，因天道以推圣德，以及圣学惟求合天而无所损益。张载有如此的观念，很难料想“为天地立心”的主张竟然也出自张载笔下。

张载著名的《西铭》开篇即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将乾坤称为父母，人谦恭地如鱼得水般生活在天地间，倒是有些老庄哲学的味道，这与他的“横渠四句”可说是相悖的。

张载还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桔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这里是说圣人之心应当“合天心”，天心才是第一位的，这与“为天地立心”也是相悖的。张载又说：“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正蒙·大心》这句话其实可以批评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这一说法的。

“为生民立命”也有问题，应当主张和鼓励生民自立其命、独立思考，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哪个人能为生民立命？哪个人有权为生民立命？“为生民立命”这种想法确乎仁义涌动，恢宏壮阔，但太过霸气。有这种霸气，所以才有封建的王侯将相和所谓圣人圣教。如果真有哪位“圣人”为生民立命，那么“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人成圣而万民愚。成就了一个圣人，同时也成就了无数迷信迷途失去自我主宰、自我灵明的羔羊，于是“为生民立命”便急转为南辕北辙，好心干坏事。

再看“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圣”字值得注意。哪个人是“圣”？是皇帝指定的？红头文件指定的？我对“继绝学”也有看法，学术是前进的，是与时俱进的，当有的学说已经不合时宜，理当随着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一道消亡（这种消亡也可能表现为否定的方面而被整合进新时代中，即黑格尔所谓“扬弃”），而不宜寂然不动地硬撑着，让这些过时的“绝学”来禁锢新的活生生的生活，甚至用所谓“绝学”来抑制新时代、新学说、新文化、新价值、新观念。

“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其意善良，但如果有谁为“万世”开了“太平”，成为“万世师表”、“万世宗师”、永远的救星，这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位开了万世太平的主儿便会被后人供起来，后人就开始了教条主义的一劳永逸的生活，后人只靠儿童读经就能过美好生活了。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有这样的言论：“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一劳永逸”。²⁶试问假如真有人开了如此的万世太平，后人教条主义的生活难道就太平吗？我想，那后人会失去自我的思考、自我的灵魂的。这其实是不太平。所以这其中存在悖论。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人为万世开太平。子孙自有子孙福。子孙也有子孙不得不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新困惑、新烦恼，但同时也为子孙带来了开新的机遇。如果有了“万世师表”、“万世宗师”、永远的救星，那么后世就只能不断回头看，等着祖先在故纸堆中甚至是在坟墓中发号施令了。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要面对的新问题。还是把眼前的事情以及我们能够预见的未来这个范围内的事情扎实地做好吧。

看着郭齐家先生在留言本上写下的“横渠四句”，我却想到了黑格尔的“扬弃”，想到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想到了胡塞尔的“回到事实本身”，想到了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处理后喻文明、互喻文明和前喻文明提出的告谕，……尤其想到了“美国的孔子”爱默生的话语：“自然以自己充溢的生命环绕在我们的四周，并流入我们体内，它用自己提供的力量邀请我们与自然协调行动。我们被这样的自然所笼罩，

²⁶ 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为什么还在过去干枯的骸骨中摸索，或从旧衣橱里拿出古装披在活生生的一代人身上？”²⁷

也许是节目中的辩论氛围尚未褪尽，记忆中我的留言是：

为天地立心—→天地自有其心，

为生民立命—→生民自立其命，

为往圣继绝学—→学说竞放当可绝处逢生，

为万世开太平—→创新与超越乃开万世太平。

Children Read Ancient Classics and Moral Education

----- Discussion with Mr. Guo Qijia

Liu Xiaod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Mr. Guo Qijia advocates that children read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and his essays on the Internet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This article has the discussion with Mr. Guo Qijia i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erners; th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ancient classics; the best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ancient classics; the func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ancient classics etc.

Key words: children read ancient classics; preschool moral educ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Guo Qijia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十五规划课题：“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学省思

（文中观点谨请读者批评。作者电子邮箱 liuxiaodong@njnu.edu.cn）

²⁷（美）爱默生：《论自然》，见《爱默生演讲录》，孙宜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